

/ 社 / 会 / 学 / 系 / 列 /

当代
学术棱镜
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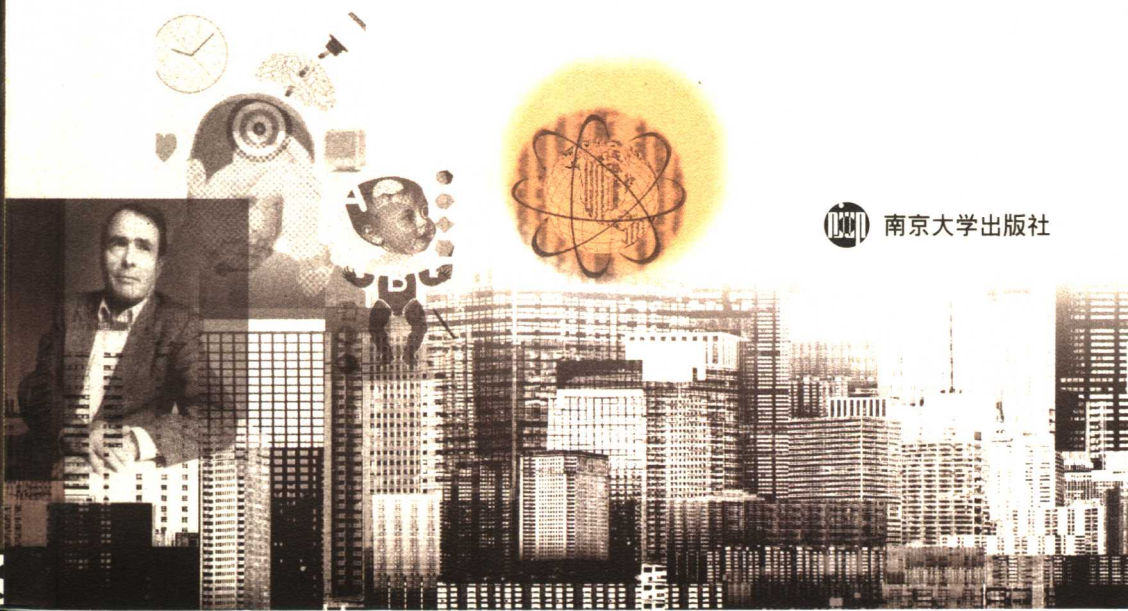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科学的社会用途

——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成富 张 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社会学系列-

科学的社会用途

——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成富 张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法] 布尔迪厄 (Bourdieu, P.) 著; 刘成富, 张艳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4438-5

I. 科... II. ①布... ②刘... ③张...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4144 号

*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science
Pierre Bourdieu
© INRA, Paris, 1997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4-005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成富 张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本 965 × 1 270 1/32 印张 2.625 字数 84 千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438-5/C·142

定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示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科学质疑”文丛收集与科学和科学活动相关的哲学、方法论、人类学、社会学或伦理学等方面的文章,既对国家农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开放,也对外界的作者开放。

文丛负责人:艾蒂安·朗戴 拉斐尔·拉雷尔

“科学质疑”工作小组希望,能够有利于对科学活动以及对其内涵进行研究的作者,进行批评性思考。小组的最初理想是,进一步丰富国家农业研究所的内部思考,为它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且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形式,使人们在当代科学和研究的辩论方面有所启迪。

在艾蒂安·朗戴、拉斐尔·拉雷尔的协助下,
文本的整理工作由作者完成。

目 录

总 序	1
布尔迪厄的用途 成伯清	1
前 言	23
引 子	28
“场域”，相对自主的小世界	29
科学场的特性	35
两种科学资本	38
观点空间	43
国家农业研究所的特殊情形	46
超越表象和虚假矛盾	49
几个规范化建议	52
一种集体转化	55
讨 论	58
译后记	70

布尔迪厄的用途

成伯清

以“用途”来说一个人，颇有把人当作工具的嫌疑，至少显得不够尊敬，尤其是对蜚声世界的学者。但是，就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而言，我们相信这种表述并无唐突之处。布尔迪厄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对他惟一适当的尊敬，就是利用他所做的工作，以及其他人在他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所做的工作，以便超越他自认为所取得的成就”。¹另据布尔迪厄的一贯主张，“社会学所提出的每个命题，能够而且必须适用于从事这种科学的主体”²。所以，讨论布尔迪厄的用途，应该符合布尔迪厄的愿望。

布尔迪厄之所以有用，当然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工具，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社会世界有帮助。下面我们在简要介绍布尔迪厄“其何许人也”之后，就来看看他到底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洞见。由于这是一篇导读式的文字，我们将尽量为布尔迪厄勾勒出一幅思想肖像，以方便读者诸君欣赏正文。但由于笔者不谙法文，也只好就所能接触到的英文资料来“涂鸦”了。好在国内学界对于布尔迪厄的兴趣正日趋浓厚，这也算是凑份热闹吧。

学术生涯

布尔迪厄在一次演讲中曾言：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没有个人传记，只有职业生涯³。大概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布尔迪厄总是刻意避免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

1 P. Bourdieu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49.

2 *Ibid.* 177.

3 R. Harker, C. Mahar, & C. Wilkes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40.

不过,从他所留下来的学术著作,确实不难看出他一生的“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当然,这其中有多少属于个人反思的结果,有多少又是时代的现实和学术问题的表征,委实是个难有定论的问题。但一向拒绝“空洞理论”的布尔迪厄,肯定是将社会学的分析与自身所处的历史境遇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布尔迪厄思维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解释了自身”¹。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强调“个人性即社会性”(the personal is social)。

布尔迪厄生于1930年,2002年辞世。其实,自198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不朽者”的行列。根据布尔迪厄的忠实英译者耐思(Nice)在1985年的观点,关于布尔迪厄的过去,存在着两种版本的说法:一个有点神秘,认为这是一个“遭遇都市文明的农家男孩”的故事;另一个呢,则有点像一个小资家庭出身的人成功登上社会阶梯顶端的故事。事情的真相,可能是两者的折衷:布尔迪厄出生于法国西南部贝亚恩(Béarn)地区的一个小镇,父亲早年是个农民,后来成为邮局的一个公务人员。由于地处具有独特方言和文化的乡村山区,使布尔迪厄非常熟悉当地农民的生活与心态。正如在1987年芝加哥研讨班上,布尔迪厄经不住华康德(Wacquant)的一再追问,终于讲述了一点个人的经历:“我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很小的偏僻村庄里度过的,就像城里人所说的,那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而我要适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就只得抛弃我的许多原始经验和早年习得的东西,不仅仅是某种口音……人类学和社会学容许我与自己的原初经验协调起来,毅然地承担它们,坦然地接受它们,并且无需丧失任何我随后获得的东西”²。从这段表白可以看出,进入社会学领域是布尔迪厄确立自我认同的重要契机。在《实践的逻辑》“绪论”中的一个注脚里,布尔迪厄提到,“社会学可以通过提供人们藉以重新占有经常作为特定社会剥夺的基础的认知与评价图式的工具,而实现解放的功能”³,这显然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由衷之言。当然,布尔迪厄另外也说过:“社会学是一门只有内行才懂的科学——入门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实现整个世界观的真正皈依——但它又经常似乎是谁都能懂的。”

大致看来,布尔迪厄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他1951年进

1 Ibid.28.

2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04.

3 P. Bourdieu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286.

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算起,一直到1968年止。在这个阶段,布尔迪厄主要是接受哲学的训练,并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布尔迪厄认为自己的“无形学院”是在哲学家中间¹,并且一直自认为是个哲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类学家²,但布尔迪厄在读书期间,对当时哲学界的主流取向却并不心悦诚服。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布尔迪厄其实是试图通过社会学的途径来解决许多哲学的问题,所以,他后来不无幽默地自称是“嘴里叼着社会学”³。当然,准确地说,他所从事的应该算是“哲学的田野工作”(fieldwork in philosophy)。这种哲学关怀,在其晚年所著的《帕斯卡式的沉思》(1997)中显露无遗。

1955年毕业以后,布尔迪厄到一所外省中学教书。1956年入伍,随军驻阿尔及利亚两年。正是在服役期间,布尔迪厄撰写了《阿尔及利亚人社会学》一书,于1958年在巴黎出版。这本文化人类学的著作,既立足于布尔迪厄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也使用了不少二手文献,书中所使用的理论视角,参照了不少美国学者有关文化与文化变迁的观点。1958~1959年,布尔迪厄继续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经验研究,同时也在阿尔及尔大学任教,曾经讲授过“迪尔凯姆和索绪尔——试图确立产生‘纯粹’理论的界限”⁴。

在完成了实地研究后,布尔迪厄于1960年返回巴黎,在这一年里,他听过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讲座,并担任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的助手。据阿隆后来的回忆,布尔迪厄在他所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上,几乎从不讲话。自1961至1964年,布尔迪厄到里尔大学任教,但仍定居于巴黎,无疑,他并不想因此而离开学术中心。1964年,布尔迪厄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同年,开始担任阿隆在1961年所创立的历史社会学欧洲中心的实际负责人。正是借助于这一机构,布尔迪厄与他早期研究队伍的核心骨干,比如布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帕瑟隆(Jean-Claude Passeron)等人,建立起了联系。

作为战后法国社会学界执牛耳者的阿隆,应该说对布尔迪厄学术生涯的起

1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64.

2 P. Bourdieu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7.

3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北京:三联书店,“引言·致读者”,第2页。

4 P. Bourdieu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6.

步帮助不小,尤其是为他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性资源,但他们两人在政治立场和个性气质上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他们的关系,由最初的相互尊敬,慢慢走向了分道扬镳。1964年布尔迪厄与帕瑟隆发表的《继承人》,从阶级的角度对法国的大学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让阿隆感到非常不安,而且这本书后来确实在学生运动中为激进学生所推崇,尽管有点滥用的味道。虽然在随后的1965年,布尔迪厄曾将自己的一本书题献给阿隆,但他们还是在1968年彻底破裂。众所周知,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针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阿隆公开鼓吹应当限制学生参与大学的事务,并以自己的社会学中心的名义为号召。深感“道不同”的布尔迪厄,带着一群亲密的合作者,离开阿隆,成立了自己的“欧洲社会学中心”。这一破裂应该给双方都带来了失望和沮丧。阿隆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为布尔迪厄留下了一幅经常为布尔迪厄的反对者所津津乐道的画像:“他的确不辜负期望,该他当一代人中的‘大人物’。可是他还没有表现出来他会变成这样一种人:宗派的头头、自信而又喜欢支配人、大学里搞阴谋的专家、对那些可能使他不愉快的人毫不留情”¹。其实,阿隆与布尔迪厄之间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可以很好地用布尔迪厄所喜欢分析的社会出身和人生轨迹来解释。另外,布尔迪厄旗帜鲜明、入木三分的批判风格,确实也容易使他要么是吸引信徒,要么就是树敌。

从1968年起,布尔迪厄应该算是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这是他确立自己的社会学地位和风格的时期,到1981年进入法兰西学院,可以说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事实上,通过建立“欧洲社会学中心”,1975年又创办自己的社会学刊物《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注意,这一刊物的取名非常讲究,体现了布尔迪厄有关社会科学的基本观点:“研究行为”与最终结果一样重要,以揭示掩饰现实真相的社会机制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具体操作过程公诸于众,以避免学术话语自我神圣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围绕着布尔迪厄,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国社会学派,在规模和影响上,都堪与迪尔凯姆当年所创立的学派相媲美²。正如迪尔凯姆当年撰写《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样,布尔迪厄也推出了自己的社会学准则,此即《社会学家的技艺》一书。在该书出版20年后,布尔迪厄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时出版此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他无法接受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入侵

1 雷蒙·阿隆(1992):《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北京:三联书店,第440页。

2 See D. Swartz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

(当年美国社会学方法大师拉扎斯费尔德到巴黎讲学时,法国社会学家都去听了,而布尔迪厄则刻意避开)¹。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学认识论主张,另一方面则通过“编辑”先贤的相关论断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当然,布尔迪厄更多地是以详实的研究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学主张。其间,《实践理论大纲》(1972)、《区隔》(1979)、《实践感》(英译书名改为《实践的逻辑》)(1980)可谓是代表作。

如果说布尔迪厄在前面两个阶段主要埋头于科学的研究,那么,进入法兰西学院以后,布尔迪厄早期隐含在科学话语中的政治关怀开始公开表露出来。作为对法国教育制度和名牌学校体系的长期批判性研究的结晶,1984年出版的《学术人》一书,就尽显了批判的锋芒,以至于布尔迪厄仿效中国明代哲人李贽,称之为“焚书”——当然是因为“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中其痼疾”(李贽《焚书》“自序”中语)。1989年又出版《国家贵族》一书,揭示了法国统治阶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在对支配群体和机制进行了研究以后,布尔迪厄又逐步将自己的社会学目光(sociological gaze)转向了社会底层。1993年,厚达1000多页的《悲惨世界》出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牢固树立起布尔迪厄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堪称是布尔迪厄的政治轨迹中的重要事件²。这是一项由布尔迪厄领衔、20余位社会学家参与的真实意义上的集体事业,而且,这本书如实描绘了“不同观点的空间”(the space of points of view)³,让“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s)的当事人,自己诉说,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构成了一幅以科学方法为支撑的90年代法国底层社会不幸生活的全景图。其中除了经济贫困外,更侧重于社会排斥、文化剥夺、种族主义,以及下层民众与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

从此以后,布尔迪厄逐渐地步出书斋,甚至走上大街。其实,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使用科学的社会学分析,来揭示维持统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无论是早期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考察,还是后来对法国教育体系的研究,都是希望

1 P. Bourdieu (199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P247.

2 D. Drake (2004). Pierre Bourdieu: from “sociologue de la domination” to “sociologue des dominés”.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12, No.3, 2004, pp. 319 - 333.

3 P. Bourdieu, et al.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洞悉统治的无形机制的前提下,找到撬动不平等现实的支点。布尔迪厄在这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抗议和斗争,可能更多地基于价值判断而非细致深入的科学研究。在布尔迪厄看来,如果不能弄清前因后果而贸然采取行动,势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大概正是因为看清了统治的机制,布尔迪厄也只是进入法兰西学院以后,才充分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已经积累起来的符号资本,开始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积极介入到现实政治问题之中。

在生命的晚年,布尔迪厄通过公开演讲(包括在电视上揭示电视的符号暴力)、公开信、创办出版社、独立发行系列小册子等方式,来参与和干预社会讨论和社会运动,为社会弱势群体伸张和呼吁,特别是对经济全球化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出了尖锐的批判。在他去世以后,有人认为,布尔迪厄是继卢梭之后,另一位让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¹。

当然,对于布尔迪厄后期的转向,也有不少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布尔迪厄变得个人自大,在政治上太自以为是,在学术上也惟我独尊。还有人觉得,布尔迪厄越来越像他自己在《国家贵族》中所分析的高官了。甚至,还有人指控布尔迪厄为来自左翼的“社会学恐怖主义”(sociological terrorism)²。

如果稍作总结,布尔迪厄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深挖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下来的既定范畴和思维模式的社会根源,二是揭示由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以理性和文化的名义实施的微妙统治,三是直接针对现实中显明的权力和特权模式以及支持它们的政治展开批判³。归根结底,布尔迪厄的批判,凭借的是对社会秩序借以掩盖自己的专断性以及复制自身的社会过程与机制的洞悉。

这种彻底而执著的批判,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当代的许多学者,不无失落地发现,如今的世界俨然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批判立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根基——这大概也是布尔迪厄的独特魅力所在。事实上,尽管布尔迪厄并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就立足于严谨科学研究的批判精神而言,我们或许得说,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

1 陈彦,“韦伯之后的社会学界碑:布尔迪厄及其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明报月刊》,2002年4月,第60~63页。

2 J. Verdes-Leroux (2001), *Deconstructing Pierre Bourdieu: Against Sociological Terrorism from the Left*. New York: Algora.

3 L. Wacquant (1998), “Pierre Bourdieu”, in *Key Sociological Thinkers*, edited by Rob Ston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217.

所以,给世人留下了将近 50 本著作和 500 余篇文章的布尔迪厄,绝不只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学者,而是一位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改造世界的哲人。

基本观点

布尔迪厄反对为理论而理论的空谈,但他并不反对理论,恰恰相反,在他看来,首先必须具有理论上的武装,或者说,一种认识论的警醒,我们才能同“自发的社会学”(spontaneous sociology)决裂,才能真正征服、建构和确证社会事实,并揭示其中隐含的机制。那么,布尔迪厄的理论出发点是什么呢?

在概述布尔迪厄核心观点的尝试中,最常见的做法,是从布尔迪厄如何超越社会学理论里的诸多二元对立问题入手。这种选择,在我们看来,并未切中要害。首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不是一种学究式的社会学,而诸多的二元对立,恰恰源于一种学究思维。布尔迪厄从实践出发,从模糊的实践感出发,并不需要首先面对这类问题。其次,布尔迪厄确实分析了诸多的二元对立,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分类体系,但其路径不是结构主义的,而是建构主义的,是要深入探究这类二元对立背后的构成机制。当然,布尔迪厄的理论确实有助于我们超越诸多虚假的二元对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也是应有之义,甚至可谓是一种附带的效应。在这一点上,布尔迪厄与吉登斯截然不同,他并没有去刻意营造一个体系,以带有浓重思辨色彩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当然,布尔迪厄不能不面对社会学中既有的概念,有时是为了显示差别以给自己的观点定位,有时是不得已用现成的概念表述新颖的思路,他确实是没少与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纠缠,但显然,围绕这类话题展开的论述,并非其主旨所在。不过,从这种叙述布尔迪厄的方式,倒是可以看出当今社会学界接受布尔迪厄的路径,并由此折射出当今社会学界的关注焦点。

那么,怎样才是比较可取的切入布尔迪厄思想核心的方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一下布尔迪厄对人类社会的假定,或者说,审视一下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哲学人类学前提。这一前提应该也是布尔迪厄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对此,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就有提示:

人注定是要死的,而这一结局不能成为一种目的,所以,人是一种没有存在理由的存在。正是社会,而且仅有社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存

在以辩护和理由；也正是社会，通过产生据说是“重要的”事情或位置，而产生出被自己以及他人视为“重要的”行动和行动者——由此，各色人等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获得自己的价值，并因此摆脱了无关紧要 and 微不足道的状态¹。

不难看出，布尔迪厄在某种意义上，是进一步发挥了迪尔凯姆“社会即上帝”（society is god）的命题，认为社会通过设计各种游戏以供个体参与，并使他们在群体或体制中获得特定的名分和位置，从而帮助个体克服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和根本上的荒谬性²。简言之，社会世界给予个体以存在的理由（reasons for being）³。换句话说，布尔迪厄认为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最终根源，是对意义和尊严的渴望，而非表面上所看到的游戏带来的利益。从这种假定中，我们不难看出自帕斯卡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

正是把对尊严的渴望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使布尔迪厄依照承认或认可的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来理解社会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布尔迪厄非常看重社会设计各种游戏的机制，这种机制布尔迪厄称之为“社会魔术”或“炼金术”。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分析，布尔迪厄尤为措意于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

没有一种权力会满足于仅仅作为权力而存在，也就是说，不会满足于作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粗暴力量而存在，或者说，作为专断的力量而存在。相反，权力必须为自己的存在与所采取的形式寻找理由，至少必须确保权力背后的专断性得到误识，因此而被人承认为正当的存在。当然，从实际状况来看，正当性问题也是由多种权力形式并存的格局所造就的，因为通过不同权力之间的对峙，通过它们之间因相互反对而提出的对立的、经常是无法调和的辩护理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自身存在的理由成为问题⁴。

1 P. Bourdieu (1990). "A Lecture on the Lecture", i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96.

2 L. Wacquant (1998). "Pierre Bourdieu", in *Key Sociological Thinkers*, edited by Rob Ston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218.

3 P. Bourdieu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240.

4 P. Bourdieu (1996).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265.

所谓符号权力,其实更多时候并非指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力,而是指绝大多数形式的权力的一个层面,即谋求转化为一种符号形式,披上正当性 (legitimacy) 的外衣。但另一方面,符号权力也有自己的特性,因为这是一种“制造世界的权力”(worldmaking power),因为它涉及到将有关社会世界及其划分的正当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符号暴力则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¹。符号暴力与符号权力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只是符号暴力更加侧重于被支配者如何将自身的被支配状态接受为正当的状态,而符号权力则是诱使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赞同的正当化权力²。但无论怎样,它们都离不开权力行使对象的“误识”(misrecognition)和“合谋”(complicity)。布尔迪厄说,“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误识”³。事实上,当公开而直接的暴力可能遭遇集体抵抗,施暴者也可能成为暴力抗争的牺牲品时,放弃赤裸裸的掠夺和剥削,而改用符号的——亦即柔和的、软性的、无形的,因而也是易被误识的——暴力,诸如义务、信任、忠诚、友情、道义、恩惠、尊敬之类与荣誉伦理有关的手段,就是最省力,也最经济的。⁴但如此一来,社会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的真相就被遮蔽了。而且,这种符号暴力可能渗透在整个符号和意义体系之中。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一向自诩为社会真理的发现者,但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经常处于最不利于发现或认识到符号暴力的位置上,特别是那些由社会系统施加的符号暴力,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广泛深入地受制于符号暴力,而自己还日复一日地为符号暴力的行使添砖加瓦”⁵。

布尔迪厄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科学的最大功效,就是一种揭露或者解蔽 (revealing, unveiling, uncovering),揭示误识的机制,并进而揭开符号暴力的根基。至于这种方法能否真的实现人类的解放,尽管不无异议⁶,但终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追求。尤其是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探索,就是

1 布尔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21页。

2 See D. Swartz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89.

3 布尔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22页。

4 P. Bourdieu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27.

5 布尔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25页。

6 See Kyung-Man Kim (2004). "Can Bourdieu's Critical Theory Liberate Us From the Symbolic Violence?"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Volume 4 Number 3. pp.362 ~ 376.

要形成一种抵抗性的力量,以防御和消除符号暴力,促进社会正义。

最无所不在的符号体系当然是语言,布尔迪厄对语言和符号权力关系的研究用力甚多¹。在他看来,“社会世界是为词语而斗争的场所,而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则应归结于这样的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以及改变词语,或更一般地说,改变表象,已经是改变事物的一种方式”²。当然,布尔迪厄也指出当代哲学的一个不良倾向,即过分迷信语言的魔力,以至于“把学术评论视同政治行动,把文本批判视同抵抗的功绩,把词语秩序中的革命体验为事物秩序中的彻底革命”³。但毫无疑问,“社会学家的词语有助于创造社会世界。社会世界越来越多地受到物化的社会学的抑制。未来的社会学家(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然如此了)将会越来越多地在他们所研究的现实中发现他们前辈的沉积物”⁴。时时注意反思的布尔迪厄,在这里其实也给了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的警示:自然科学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而社会科学在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比如民意测验技术成为统治的工具。布尔迪厄在一次对话中,就对当年没有响应戈夫曼的倡导撰写一份反对滥用社会科学的共同宣言而颇有悔意。⁵即便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今天我们在描述、理解和诠释社会现实的时候,确实容易受到既定的社会学概念和思维定势的系统性扭曲。

布尔迪厄又是如何从总体上来描述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呢?这涉及到布尔迪厄对整个人类行动世界的理解。对此,笔者尚未发现布尔迪厄直接的阐说,这与他无意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理论的取向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不难从他在《国家贵族》一书中对社会学的任务所作的开门见山的论说中找到大概的线索。布尔迪厄写道:

社会学的目标,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的不同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掩藏最深的结构,以及旨在确保它们的再现或

1 P. Bourdieu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 P. Bourdieu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54.

3 P. Bourdieu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2.

4 P. Bourdieu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54.

5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北京:三联书店,第53页。